



马悦然，1924年出生，瑞典汉学家，瑞典文学科学院院士、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，高本汉的学生。

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译为瑞典文，也译过沈从文、鲁迅，以及李锐的小说和北岛的诗。他对中国的情感难以言语，以至于他用中文写作了散文集《另一种乡愁》

他的上任和现任妻子都是中国人。

马先生：学者和丈夫

1950年秋离开之际，马悦然已经把中国当作“第二祖国”，彻底迷上了中国文学。

“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呢？就说诗歌吧，从诗经到当代作品，中国诗歌有三千多年历史。八世纪，我的同胞还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野蛮生活，唐朝诗人就在创作古诗、绝句和律诗。汉乐府、南北朝的山水诗、宋词、元曲也非常美。谁读过它们，谁就会爱上中国文学。”

马悦然还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——成都学者陈可行的女儿陈宁祖。1950年7月，马悦然从广州拍了封电报回成都求婚，宁祖答应了，并由姐姐陪同赴广州。兴奋的马悦然每天早晨坐火车到罗湖桥，饿着肚子等未婚妻。十多天后，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瑞典式婚礼。

回瑞典后，在方言资料的基础上，马悦然完成了硕士论文，不久获汉学博士学位。到1970年代，他已经是有国际性声誉的汉学家了。

马悦然努力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。1948年翻译了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之后又译介了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先秦诸子，翻译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古代小说。这也加深了他的理解，他的观点是：“我没有翻译过的作品就不算读过。”

1956年至1958年，马悦然重返中国，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。他经常和陈宁祖骑着自行车，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拜访文化名人、出席文化活动。当时马悦然的邻居是老舍，两家人结下了深厚情谊。数十年后，老舍的幽默感还让他念念不忘。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、了解，马悦然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，陆续翻译了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，及闻一多、卞之琳、郭沫若、艾青等人的诗歌。

马悦然的关注是持久的，由此亲见或旁观了中国的建设、进步与动荡。改革开放后，“新时期文学”登场。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《绿化树》、李锐的短篇小说集《厚土》和长篇小说《旧址》。他还特别喜爱北岛、顾城、杨炼等“朦胧诗人”。

“宁祖对我帮助很大。她热爱中国文学，读得比我快，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作品。她常常告诉我：这本书非常好，你非看不可！”1996年11月陈宁祖患癌症去世，为了离妻子的墓近些，马悦然搬到了乡下。

马评委：发掘者和推动者

马悦然的勤奋是众所周知的。1997年，余华等中国作家到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图书馆观摩，工作人员特意摆出马悦然的专著和译作，堆满了一张大桌子，而且还不是全部！余华从此对这老头敬佩有加。

马悦然最大的贡献是发掘了好些被人遗忘的诗人、作家。1979年他回成都探亲，岳父的老朋友送了一本杨吉甫的诗集。“很短，但是太好了。”马悦然把它们译成瑞典文、英文。他认为杨吉甫的小诗纯净、天真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位1962年逝世的诗人“一直说真话，从不说大话，也不会说假话”。马悦然说，这样的诗人在天堂里会有一块云专门给他坐。

1985年，马悦然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，两年后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。学术贡献是主因，另一个因素是，“诺奖评委里总要有懂中文的吧！”

由于这重身份，马悦然和中国的关系更趋紧密。他也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，编译了《中国八十年代诗选》《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00—1949》。他还大力引介李锐、北岛、余华、莫言、曹乃谦等当代作家，他们也因此获益，不少作品被译成了外文。马悦然曾为沈从文的逝世倍感遗憾，“他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，最后一年铁定是他。可惜啊！”好在莫言获了奖，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崇得到了权威肯定。

2005年，马悦然和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结婚，两人相差43岁，结缘于布袋戏。2012年10月下旬，穿着白色唐装，牵着妻子的手，马悦然抵沪讲演、交流。这次，他带来了由他译成中文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《巨大的谜语》和自传《记忆看见我》。特翁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不过，马悦然被提问最多的还是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。

传言、争论阴谋论一般在他四周缠绕、扩散。但人们似乎忘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长达60年的关注和推介，也忘了在高福利的瑞典，人们看重的东西与我们迥然有别——先不说瑞典学院院士的待遇，马悦然曾因翻译曹乃谦作品获过奖，奖金即高达10万瑞典克朗，他根本不缺钱。■

对话 Dialogue

“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作家”

生活周刊：莫言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论，比如认为莫言的作品立场中性，缺乏批判精神。

马悦然：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，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，可以说，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。我对中国和欧洲的媒体有一些意见。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，很多媒体就说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，是官员，他怎么能得奖？批评莫言的媒体一本书都没有读过，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就胡乱“开枪”，这让我非常生气。第二，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，别的人不敢。有些跑到国外去非常爱讲话的人，轻易地批评他，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。

（陈文芬补充：马悦然在瑞典批评了瑞典媒体，他说要是你们都不读书，就断定一个作者不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这是一种“知识分子的懒惰”。）

生活周刊：但人们会说，中国同样有很多优秀作家有资格获诺奖。

马悦然：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的奖，它只是颁给一个好的作家。世界上的好作家成千上万，但每年只能颁给一个，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，他是一个好的作家。那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文学完全是主观的，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，我能说的是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，所以颁给了他。

生活周刊：那您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，说服其他评委的过程是不是很激烈？

马悦然：每年的讨论都很激烈（笑），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

翻译家是“奴隶”

生活周刊：中国籍作家的获奖，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边缘化，走向了世界？

马悦然：中国文学早就世界文学的一部分，达到世界级水平了。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，但是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了，在外国没有读者。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作者，所以莫言的著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学为世界所认识，是很有帮助的。瑞典学院的前任常务秘书说，世界文学就是翻译，他说得很对，没有翻译就只有法国文学、瑞典文学、西班牙文学、中国文学，没有世界文学。

生活周刊：提到翻译，众所周知您翻译了大量中国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，其数量超过大多数汉学家。您为什么热衷于翻译？

马悦然：读到自己喜欢的中国文学著作，我就很想翻译成母语。我觉得我对我的同胞有责任，把我自己欣赏的书译成瑞典文，让他们也能享受我所享受的文学。这是应该的。当然我能力有限，不能够翻译所有喜欢的作品，我需要选择。我的标准是能代表作家最高水平的著作。我喜欢闻一多，就翻译他的《死水》跟《红烛》，喜欢沈从文，就翻译了他的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。我也翻过曹乃谦、莫言、杨牧的作品，标准是一致的。

生活周刊：那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

来才进行最后的投票。但今年其实不太激烈，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。

生活周刊：作家本人会对你们产生影响吗？您曾说很多中国作家联系您，希望得到您的推荐。

马悦然：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信和稿子，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，让我翻译成瑞典文，好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。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。有一个山东的文化干部，他半年之前不知道给我寄了多少信，送给我很多画、很多古书，我统统退回去了。他跟我说他钱是很够了，拿到诺奖后奖金留给我，名誉归他。但是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、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给我写这样的信。

（陈文芬补充：马悦然的意思是，中国有很多所谓的“干部作家”，和真正的作家不同。而那些真正的好作家，反而害怕跟马悦然见面。）

生活周刊：那您自己最喜欢莫言的哪些作品呢？

马悦然：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莫言所写的最好的东西。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是幽默感很强的，还有《会唱歌的墙》和《姑娘翱翔》。《小说九段》也非常棒，他让我想起沈从文的短篇。后来和妻子合作写了100篇微型小说，就是模仿的《小说九段》。

生活周刊：不过您觉得莫言的长篇小说太长了。

马悦然：是的，像《生死疲劳》，前面80%非常好，到末了就不够韵味了。那本书缩短一些就更好了。这是我自己的看法。

好的翻译？

马悦然：如果说诗人是造物者，译者就应该是技术纯熟的工匠。依我看，译者应该听主人的话，像奴隶一样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译者要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：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。所以，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，译作必须近似原文。译文有时候可能会显得优于原文，但译者绝不能试图超越原作者。

（陈文芬补充：“奴隶”只是个比喻，马悦然对翻译的正式表述都写进了《巨大的谜语》的译者序里，可参考。）

生活周刊：这次您“角色反串”，把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文作品翻译成中文。不过由于他是诺奖得主，已经不少人翻过了，你为什么要重来一遍？

马悦然：我提到过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、水浒传有4种英译本，红楼梦有五六种。每一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方式。据我说知，托马斯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：李和董继平。比较他们的译文，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也有很多错误。所以，我需要自己译一个版本。这是我的责任。

生活周刊：您也很喜欢中国当代诗人，也翻译了很多作品，比如北岛这两年呼声就一直挺高。怎么这次不把诺奖颁给中国诗人？

马悦然：，也许明年吧。（笑）